

列傳)、〈袁盎黽錯列傳〉、〈張釋之馮唐列傳〉、〈萬石張叔列傳〉、〈田叔列傳〉。是藉謀反者、漢代開國將相，及漢初丞相、賢臣的傳記，勾勒出漢代政治環境的梗概及帝國統治的基石。承前四冊風格，此冊譯文在注釋上亦佔有大量篇幅，每篇後並附上一份簡易的參考書目及「譯者註記」(Translator's Note)，此部分是對各篇在《史記》中之地位與內容進行總結、檢討和評述。最後，本冊附錄有四：(一) 中國歷代《史記》注疏家之中文姓名、拼音，及生卒年表；(二) 簡介德國《史記》學者

Erich Haenisch (1880-1996) 及唐·劉伯莊 (631-650) 生平與著述；(三) 近年中國、日本、德國、法國、美國、俄羅斯關於《史記》研究的論文與專書；(四) 書末索引。

在素材的選擇及內容的安排上，倪豪士《史記》英譯本因展現出無與倫比的精密與詳實，而使其超越譯本，為譯著與研究共同溝通出一條嶄新的道路。(李鏡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碩士生)

## *Wuhan, 1938: War, Refugees, and the Making Modern China*

By Stephen R. Mackinn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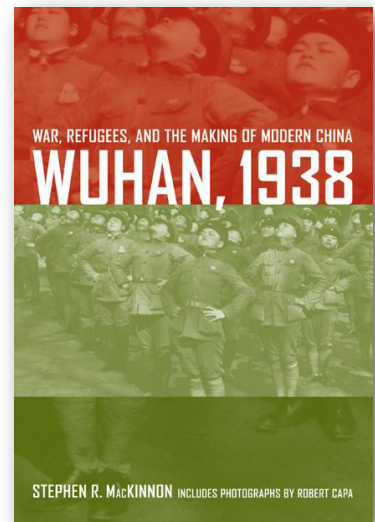
204pp. ISBN 978-0-5202-5445-9

Stephen MacKinnon 的 *Wuhan, 1938: War, Refugees, and the Making Modern China* (《1938 年的武漢》) 是第一本以武漢在 1938 年的重要性及其在抗日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主題的專書。而且，就戰爭策略、救濟工作、媒體報導及國際關係等方面而言，MacKinnon 認為由於當時的政治領袖所作的正確選擇，武漢變成為一個正面的典範。雖然許多學者認為那時武漢的榮華一散而去，無法長久，但是 MacKinnon 卻認為武漢不僅為當時戰爭的關鍵點，其美好的典範應繼續傳給後世知道。

作者對抗日戰爭時各關鍵城市的歷史背景加以概述後，便開始敘述國民黨之所以會注重武漢的緣由與歷史。雖然日軍的軍備遠遠凌駕國軍，MacKinnon 提出國軍當時比日軍更能應變戰爭所需之說法，且頗具說服力。日本陷入戰爭非有備而來，他們並沒有事先作徹底

的計畫。但是，中國長期以來，一直研究如何預防日本的來襲。再者，日軍的準備僅限於閃電行動突襲，但國軍則逼迫他們陷入持久戰。如此一來，日軍無餘力留意俄軍在蒙古的行動。因為國軍在徐州與武漢二地能長期抵擋日軍，日軍的侵襲速度大幅減低，直到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武漢的表現無疑使中國人感到驕傲。

因為國民黨政府在徐州敗給日軍前，已先順利將人民撤走，所以許多人從徐州、南京、上海等地疏散到武漢。MacKinnon 無法說明這些難民的總人數究竟有多少，但是他對各政黨的救難計畫，卻有一個清楚的交代。他說，史良這位行動主義者，從兩黨中招募婦女來



協助照顧孤兒和棄兒。更重要的是，宋氏姐妹積極地參與戰時兒童保育會，並與蔣夫人主辦許多大會來鼓勵其他婦女自願協助。作者認為，當時的武漢充滿了一股兩黨合一的精神，使統戰有最佳的表現。

雖然有達到兩黨合作的境界，國民黨與共產黨仍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他們的行列。舉例來說，國民黨成立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名義上是個青年團，但是實質上並不然，因為最高年限竟然為 38 歲。然而，其主要作用不是招募新血，而是使黨內恢復生氣。值得一提的是，MacKinnon 認為雖然有許多學生、知識份子和記者願意積極地參與戰事，但是國民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並沒有給予這些青年很好的領導。至於共產黨，許多年輕人不需招募，而自行登門加入。

1938 的武漢以媒體自由為名，這包括中國本地及國外來的記者。此時，媒體業的蓬勃發展，主要是因為有許多有錢人願意贊助各種期刊與通報。各派的知識份子盡力催動民眾。MacKinnon 表示，如此做是因為他們自動自發地想要對國家有所貢獻，而非因為政府的協助或部分贊助。同樣的，國民黨值得讚美的決策是允許外國作者在毫無受到任何審查或限制的情況下，報導抗日戰爭的種種事情。因而，外國記者的報導常將中國人描述為英雄，使他們抵抗日軍的努力顯得更加英勇。有關武漢的新聞，改變了外國人對此戰爭最終結局的判斷，他們不再認為日軍必定會勝利，此外也促使許多國家提供援助給中國。

MacKinnon 也指出許多不同組織或機構是於 1938 年在武漢扮演重要角色。譬如，他論及保定軍官學校以及後來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說即使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畢業生的訓練較好，到 1938 年年底，保定畢業的將軍，在戰場上的表現超越陸軍軍官學校的將軍。另外，在 1938 年到武漢的外籍記者，大體而言，均為年輕、充滿理想的記者。這新的一代很快地取代「老中國通」的記者，因為他們不顧後果，願意身陷危險情況，以獲得更逼真的報導。於是，MacKinnon 不主張武漢此時經歷過一種「換代」改變的看法，而認為二代間的衝突與競爭顯出不同人群具有其特殊能力來應變

一些現實問題。

在敘述歷史的同時，MacKinnon 巧妙地納入許多歷史人物的生平資料，以便讓讀者認識在 1938 年住在武漢的人。其中一種方法是比較兩個不同的人物，來凸顯當時武漢所居住的各式各樣的人。舉例來說，MacKinnon 在第一章將政治家張之洞與企業家劉歆生相比較。後來，也討論老舍和郭沫若的不同，目的是說明當時的知識份子如何促動民眾的不同方法。雖然老舍和郭沫若在理念和學術方面相隔甚遠，但 MacKinnon 認為他們均以懷念的心態看他們住在武漢的時間，且認為是他們一生中最快樂，又最充實的時刻。他提出許多證據，說明當時的武漢可說是許多人一生的最佳時期，也是抗日戰爭的高峰。可惜的是，此後中國便因外國救援及國內腐敗官員等問題而遭遇許多的挫折與失望。

MacKinnon 承認在 1938 年之後，在武漢發生許多不幸的事，然而在此同時，他強調 1938 年所完成的事情，對維持抗日的種種活動而言，價值連城。武漢的確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當時武漢所發揮的精神，滲透到每個中國人的心中，也激發外國人士伸出援手。此外，武漢的精神反映中國政府統治的最理想狀態：二黨合一、措施切實，沒有盲從任何政治理念，也沒有要求必定要實行一種嚴格的審查制度。此書中最具有說服力之處，是 MacKinnon 提出媒體在沒有受到報導限制的情況下，對國家與社會可以有的貢獻。於 1989 年春天在北京的天安門事件前，以及蔣經國將臺灣改為民主主義前，媒體的自由均有貢獻，可視為此理論的旁證。即使國家遭遇危機，或處於極度困難時，新聞自由有助於產生「武漢之精神」。基於 MacKinnon 教授的父親和女兒皆為有名的記者，其家世或許對他注意媒體在中國的重要角色有所影響。此書的宗旨在於鼓勵中國政府的領導者，透過給予人民更多的自由，而贏得人民的忠心，且獲得世界的讚賞。（田梅（Margaret Mih Tillman），美國籍，係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余其濬，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翻譯）